

崢嶸歲月：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與實踐（1949-2000年）

連浩濤博士

(香港大學歷史系名譽副教授)

第四講 「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從「以計劃經濟為主，以市場調節為輔」 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確立（1977-2000年）

- 1978年9月，鄧小平說：「社會主義要表現出它的優越性，哪能像現在這樣，搞了二十多年還這麼窮，那要社會主義幹什麼？」他指出，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1）發展生產力；（2）使國家富強起來；（3）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
- 12月13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首次提出「讓少數人富起來」的方針：「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於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起來，生活先好起來。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來，就必然產生極大的示範力量，影響左鄰右舍，帶動其他地區、其他單位的人們向他們學習，這樣就會使整個國民經濟不斷地波浪式的向前發展，使全國各族人民都能比較快地富裕起來。」
- 鄧小平摒棄「以階級鬥爭為綱」：他認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並不存在著資產階級或其他剝削階級。但他認為「反社會主義分子」還存在，對他們必須實行專政，這「仍然是一種特殊形式的階級鬥爭」。可見，鄧並非根本地反對階級鬥爭，而是反對把階級鬥爭像過去那樣擴大化，特別是擴大到黨內。
- 鄧小平贊成改革的過程要像「摸著石頭過河」：「摸著石頭過河」是陳雲在1980年12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的：「我們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穩。因為我們的改革問題複雜，不能要求過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論研究，經濟統計和經濟預測，更重要的還是要從試點著手，隨時總結經驗，也就是要『摸著石頭過河』。開始步子要小，緩緩而行。」

- 鄧小平竭力防止「資產階級自由化」：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即主張以「西化」為改革目的：在政治上實行西方式的議會民主制和多黨制，在經濟上實行私有化，在文化上用西方的民主、自由和人權觀念對中國民眾進行「啟蒙」。

走向市場經濟的時期（1979—1991年）

1. 農村改革時段（1979-1984年）

- 鄧小平解釋為何選擇農村改革作為中國整體改革的突破口：「不管天下發生什麼事，只要人民吃飽肚子，一切就好辦了」；「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我們首先解決農村問題。中國有 80%的人口住在農村，中國穩定不穩定首先要看這 80%穩定不穩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沒有農村這一穩定的基礎是不行的。」
- 農村改革又以打破「平均主義」（「幹多幹少一個樣，幹好幹壞一個樣」）為突破點，並體現於獲中共中央於 1982 年 1 月批准在全國範圍內實行的「家庭承包責任制」（包產到戶）。自此，每個家庭承包的耕地經營好壞同每個農戶的經濟利益直接聯繫在一起，這激發起農民種糧的積極性。
- 1984 年 1 月，中共中央宣佈中國農村全面實行分田單幹，並規定土地承包期一般應在 15 年以上（到 1999 年又在原有的基礎上再延續 30 年）。
- 1985 年，又宣佈撤銷實行了 32 年的農產品「統購」制度，以合約收購方式取而代之，這使中國農村的格局越來越市場化（與農村「統購」制度一起實行的城市「統銷」制度，也於 1992 年被廢止）。
- 1979-1983 年：城鎮企業還未開始改革，尚無勞動力的需求；大量知青回鄉，更增加了城鎮就業的壓力。在此情況下，政府決定限制農村勞動力外流，並鼓勵農民就地開展多種經營（離土不離鄉），致使農村副業與鄉鎮企業在各地冒起。1983 年底，已轉入鄉鎮企業的農村勞動力達 3,000 多萬人，佔農村勞動總數的 9%。農民中又開始出現個體手工業、個體運輸和個體商業服務等經營形式；到 1984 年，個體經營的農民達 547 萬人，佔農村勞動力總數的 1.6%。
- 1979-1984 年：
 - 農業總產值增長 55.4%，平均每年增長 7.6%；

- 糧食總產量增長 33.6%，平均每年增長 5%；
- 1984 年，糧食總產量達到 40,731 萬噸，人均 800 斤，為中國有史以來最高水準，接近世界人均水準。
- 經濟特區：鄧小平於 1992 年南巡時說，他的一個大失誤就是搞四個經濟特區時沒有加上上海。但當時若把上海劃為經濟特區，一定遭到陳雲反對——1981 年，陳雲在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上就明確地表明：「（經濟特區）現在只能有這幾個，不能增多。……像江蘇這樣的省，不能搞特區。……江浙一帶歷史上是投機活動有名的地區，壞分子的活動都熟門熟路。」
- 1978-1979 年「北京之春」：運動開展時，鄧小平說：「群眾貼大字報是正常現象，是我國政治形勢穩定的一種表現，我們沒有權利否定或批判群眾發揚民主，貼大字報」；「群眾的議論，並非一切都是深思熟慮過的，也不可能要求都是完全正確的，這不可怕」；「一個革命政黨，就怕聽不到人民的聲音，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群眾提了意見應當允許，即使有個別心懷不滿的人，想利用民主鬧一點事，也沒有什麼可怕。」可見，這場民間民主運動當初是和黨內以鄧小平為首的改革運動相互配合的。
-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 年 6 月）：
 1. 鄧小平看了第四稿後指出：千萬注意不要把 30 多年的歷史寫成黑漆一團，如果這樣，就會使人們痛恨共產黨；
 2. 陳雲建議「寫黨的六十年」歷史，「增加回顧建國以前二十八年歷史的段落」，把毛澤東在解放前解放後重要關頭的作用寫清楚；那末，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說毛澤東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就有了根據，更能更說服人；
 3. 《歷史決議》表明：（1）1957—1965 年間，儘管黨的工作方針犯了嚴重的失誤，其成績還是主要的；（2）「文化大革命」（1966—1976 年）即使帶來巨大的經濟損失，但期間的國民經濟仍然取得了進展。
 4. 《歷史決議》旨在使人們認清：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錯誤只是局部的、暫時的現象，並不是它的本質和主流。即使對某個犯嚴重的、全面性錯誤的

時期，也不能簡單地否定一切。只有這樣，才不至於在批評錯誤的時候否定中共的領導地位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

- 中共「十二大」（1982年9月）：
 1. 華國鋒領導的「凡是派」，徹底退出中國的政治舞臺；
 2. 鄧小平在「十二大」開幕詞中首次提出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3. 「十二大」訂定現代化戰略目標：要使全國工農業的年總產值由 1980 年的 7,100 億元增至 2000 年的 28,000 億元（即翻兩番），令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鄧小平早於 1979 年 12 月 6 日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Masayoshi Ohira）時首次提出上述目標；他所說的「小康」水平，就是國民平均收入達 1,000 美元）。
- 政治體制改革：
 1. 鄧小平掌權後即指出，若要防止「文化大革命」再次發生，就「要從制度方面解決問題」，這「不是說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
 2. 鄧小平所講的「政治體制改革」並非外界所認識的「政治改革」（即旨在還政於民及讓公眾監督政府的改革），而是外界所稱的「行政改革」。它屬於具體的工作制度、組織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風的改革，是在堅持中共一黨專政前提下的改革，與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並不存在著矛盾。

2. 以城市為中心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時段（1985—1988年）

- 「以計劃經濟為主，以市場調節為輔」：
 1. 早在 1950 年代，陳雲就提出了「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經濟政策，即「以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為主體，個體經營為補充；以計劃生產為主體，在國家計劃許可範圍內的自由生產為補充；以國家市場為主體，國家領導的自由市場為補充」；
 2. 1979 年，陳雲指出社會主義實踐的一個主要缺點，就是忽視市場調節，即思想上沒有「利潤」這個概念。他提出：整個社會主義時期的經濟必須有計

劃經濟部分（即有計劃按比例的部分）和市場調節部分（即不作計劃，只根據市場供求之變化進行生產的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從屬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而且，在今後經濟體制改革中，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兩部分的數額不是此漲彼消的關係，而是都相應地增加；

3. 1981－1982 年，陳雲把這一思想概括為「以計劃經濟為主，以市場調節為輔」的原則，並以它作為發展商品經濟的規範。
- 「鳥籠經濟」：「鳥籠理論」確實是陳雲在 1982 年 4 月聽取工作匯報時提出的，他說：「搞活經濟是對的，但必須在計劃的指導下搞活，這就像鳥一樣，捏在手裏會死，要讓牠飛，但只能讓牠在合適的籠子裏飛，沒有籠子，牠就飛跑了。『籠子』大小要適當，但總是要有個『籠子』。」
 - 廠長負責制的局限性：問題在於廠長成功時獲得獎勵，但失敗時卻不會受到懲罰，因為國企始終是屬於國家的，政府總會伸手援助，幫國企解困，這使很多國企終於虧本。
 - 開放政策：1984 年 10 月，鄧小平重申對外開放的迫切性：「歷史經驗教訓我們，不開放不行。開放傷害不了我們。我們的同志就是怕引來壞的東西，最擔心的是會不會變成資本主義。恐怕我們有些老同志有這個擔心。搞了一輩子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忽然鑽出個資本主義來，這個受不了，怕。影響不了的，影響不了的。肯定會帶來一些消極因素，要意識到這一點，但不難克服，有辦法克服。……在本世紀內最後的十六年，無論怎麼樣開放，公有制經濟始終還是主體。同外國人合資經營，也有一半是社會主義的。合資經營的實際收益，大半是我們拿過來。不要怕，得益處的大頭是國家，是人民，不會是資本主義。」
 - 政治體制改革：1987 年 6 月 12 日，鄧小平會見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中央主席團委員科羅舍茨（Stefan Korosec）時，把政治體制改革的性質說得很清楚：「政治體制改革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所謂的民主，不能搬用他們的三權鼎立，不能搬用他們的資本主義制度，而要搞社會主義民主。我們要跟據社會主義國家自己的實踐、自己的情況來決定改革的內容和步驟」；「調動積極性是最大的民主」；「調動積極性，權力下放是最主要的內容。」
 - 胡耀邦下台（1987 年 1 月）：

- 當時外界有一種輿論，說鄧小平是改革派，陳雲是保守派；二人不和之傳聞，鬧得甚囂塵上，甚至盛傳鄧小平是受陳雲的壓力才讓胡耀邦下台的。其實，二人在國家很多重大問題上的看法是一致的，可以說彼此之間的合作是第一位的，分歧是有的，不過只是第二位；而且，分歧也不在於要不要改革開放，而在於如何改革開放。具體說，在改革的步驟、方法上，陳雲更強調改革「步子要穩」，「要從試點著手」，「要「摸著石頭過河」」；鄧小平則著重於「思想要更加解放一些，改革開放的步伐要走得更快一些」，「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看准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
- 鄧小平在 1987 年同美國當時的國務卿舒爾茨（Theodore Schultz）談話時說：「有些人對改革的某些方面、某些方法不贊成，但不是完全不贊成。中國不存在完全反對改革的一派。國外有些人過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別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錯；如果要說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
- 中共「十三大」（1987 年 10 月）：
 1.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毛澤東曾在 1960 年初指出：「社會主義這個階段，又可能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個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這大概是 1980 年代提出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思想來源。1981 年通過的《歷史決議》已明確提出：「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還是處於初級階段。」之後的「十二大」《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報告和十二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又重申中國仍然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
 2. 「三步走」經濟發展戰略----第一步，以 1980 年為基數，用 10 年把國民生產總值翻一番，人均實現 500 美元，解決溫飽；第二步，從 1990 年到 20 世紀末，再翻一番，人均達到 1,000 美元，進入小康社會；第三步，在 21 世紀的前 50 年，再翻兩番，人均 4,000 美元，達到中等發達水準，基本實現現代化。

3. 宣佈把私營經濟、中外合資合作經濟、外商獨資經濟，以及個體經濟一起作為公有制經濟必要的和有益的補充。
- 「勇闖物價關」：鄧小平在 1988 年 5 月中旬與到訪的朝鮮政府軍事代表團談話時說：「理順物價，改革才能加快步伐」；「過一關很不容易，要擔很大風險」；「但是物價改革非搞不可，要迎著風險、迎著困難上」。

3. 「治理整頓」時段（1989-1991 年）

- 1988 年 9 月開始，中國經濟進入了由李鵬主持並得到陳雲支持的「治理整頓」階段。鄧小平及時指出：「我贊成邊改革，邊治理環境整頓秩序」；「現在的局面向起來好像很亂，出現了這樣那樣的問題，如通貨膨脹、物價上漲，需要進行調整，這是不可少的。但是，治理通貨膨脹、物價上漲，無論如何不能損害我們的改革開放政策，不能使經濟萎縮，要保持適當的發展速度。現在出現的這些問題是能解決的，我們有信心。小錯誤難免，只要不犯大錯誤就行了。」
- 「新權威主義」：代表人物是原中共中央辦公廳研究室研究員吳稼祥。據「新權威主義」現代化理論代表人物蕭功秦的說法：要實現民主與現代化，就要摒棄用激進、運動的方式，而要「用開明權威政治這隻『看得見的手』，來創造民主政治這隻『看不見的手』，保持轉型的可控制性」。一般論者認為，真正接受「新權威主義」並將其變成政治實踐的人是趙紫陽。惟趙於 1996 年 10 月接受楊繼繩第二次訪問時否認有這麼一回事：「有人說我贊成新權威主義。我不知道新權威主義是怎麼回事。我不認識吳稼祥。」
- 趙紫陽在「十三大」時段的政治理念和立場：（1）黨的執政地位要保持不變；（2）執政方式要改變，即由傳統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執政方式轉變為「文明、開明、開放」的「現代」執政方式，也就是說，「在共產黨領導的基本框架下，更多地允許各種社會力量的政治參與，同時逐步以法治代替人治，把憲法已經原則規定的許多好的東西通過好的法律一一落實」（趙紫陽語）。
- 學生與黨內「開明派」有合作的可能性嗎？----1989 年學運領袖、「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副總指揮封從德：「這時大家（同學們）的主流思想還是『不參與任何黨派之爭』。無論趙紫陽還是李鵬，大家只把他們當作中共官僚機器中的一個部件，

本不抱任何希望。」（封從德：《六四日記》，台北：自由文化出版社；香港：晨鐘書局，2009年。）

- 「八九民運」與「六四事件」：

- 1989年4月22日，十萬學生在人民大會堂外悼念胡耀邦；學生代表向總理李鵬提交《請願書》，惟李鵬始終沒有露面——近年在網絡上流傳的《李鵬六四日記》特別透露他當時並不知情而非失信沒露面：「由於我（李鵬）在追悼會後就離開大會堂，對那裏所發生的事並不知道。」

- 5月11日，王丹、吾爾開希、馬少方、程真、王文、楊朝暉等人考慮到蘇聯改革派領袖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快將訪華，決定在13日發起絕食。13日，二十多個院校的二百多名學生，在一千多人的護衛下，進入天安門廣場絕食——封從德在其《六四日記》中指出：「本來，學運組織並不贊同絕食，尤其是名義上是最高組織的北高聯（高自聯）。……然而，一些個人借助『明星效應』，拋開組織，居然成功發動『個人絕食』，外界就更把這些明星誤認為學運領袖，這些『領袖』也就更能凌駕於組織之上。十分滑稽的事，外界不知道，發起絕食的吾爾開希與王丹雖被普遍認為是北高聯（高自聯）的主席、領袖，而實際上他們當時連正式常委都不是」；「非程式行為從違反組織決議的『個人絕食』開始，打開潘朵拉的盒子，學運亂象自此一發而不可收拾。這是我以後才明白的。」

王丹的回憶錄證實了絕食不是高自聯的決定，而是以「個人身分」發起的：

「儘管我（王丹）現在與當時的高自聯核心人物王超華是好朋友，但是在絕食的問題上我們是針鋒相對的，因為她是堅決反對絕食的一方」，「之所以是以個人身分，是因為現在我和（吾爾）開希等都已經不是高自聯的常委。」

在動機方面，王丹指出發起絕食者的主要考慮有三個：第一是其他手段（請願、靜坐、遊行、罷課、對話）都已經試過，但全不湊效；第二是因為絕食是非暴力抗議方式，符合他們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則；第三是希望通過絕食行動來喚起各階層人民及世界媒體的關注，進一步向政府施加壓力。（《王丹回憶錄——從六四到流亡》，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

- 5月15日，戈爾巴喬夫抵京。由於廣場急需一個能代表絕食同學的權威組織，因此「絕食團」指揮部就產生了。而「高自聯」開始意識到喪失對運動領導權的危機，反過來支持絕食，試圖重新取得運動的領導權，在廣場上同指揮部的摩擦就不可避免。封從德在其《六四日記》中說，不清楚他當時的妻子柴玲是何時、在何等情況下成為「絕食團」的總指揮。王丹在其有關「六四」的回憶錄中披露，柴玲早於12日晚就與他聯手在北京大學廣播站進行演講，動員同學參加絕食。
- 5月16日，趙紫陽與戈爾巴喬夫會晤時公開表示：「十三屆一中全會有一個正式決定，就是遇到最重要的問題，仍需要鄧小平掌舵。」趙紫陽後來憶述這段往事時說：「我的這篇講話，一舉解決了兩個問題：為什麼鄧戈會晤是中蘇的高級會晤；鄧目前仍是中共最高決策者是中央全會決定的，組織上是合法的。我當時感到這次講得非常得體，既解決了問題，形式也很自然」；「後來我才知道，鄧的家人及鄧本人對我的講話不僅不高興，甚而非常惱怒」；「『六四』後，他（鄧小平）在接見美籍華裔學者李政道教授時說過，趙在學生動亂時把他搬了出來，實際上是講我把鄧拋了出來，社會上也有這種看法。我在會見戈爾巴喬夫時，談了有關鄧在我國我黨的地位。這番話完全是要維護鄧，結果引起大誤會，認為我是推卸責任，關鍵時把他拋出來。這是我萬萬沒有想到的。」（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9年。）
- 27日上午，由十個廣場組織召開的聯席會議經過討論後決定：正式建議廣場學生在5月30日結束廣場保衛戰，回到學校，轉以校園民主、全國巡迴演講等方式繼續民主運動。王丹回憶說，當時柴玲作為「廣場指揮部」總指揮也在座，並同意了撤出廣場的決定；沒有想到的是，當他在是日下午向廣場學生宣佈聯席會議的決定後，柴玲突然向學生表示聯席會議的聲明只是建議，廣場上的全體同學才是最後的決定者。隨後進行了三百多所在場高校代表的表決，大部分代表否決了撤離廣場的建議，撤出的努力就此失敗。對這一次關鍵性的決定，柴玲在其回憶錄中解釋說，她本來同意了撤出的建議，

但是回到廣場之後，遭到李錄的強烈反對，最終令她改變了想法。（《一心一意向自由——柴玲回憶》，香港：田園書屋，2011年。）

- 28日，柴玲批評廣場上一些不良現象：「外地來的同學，本來是說到北京聲援，現在卻要在廣場上奪權！有的同學來北京白天遊長城，晚上回廣場睡覺。你們想一想，你們到底是來幹甚麼的？！」
- 29日，封從德在回應記者的問題時同樣指出：「目前廣場上多是外地同學，各個糾察隊各自為陣，山頭主義嚴重，使廣場上一切管理陷入混亂，包括財務。」（封從德：《六四日記》。）
- 6月初，廣場秩序日難維持。封從德在6月2日的《日記》中解釋說：「（這）是因為廣場人員結構變化所致：外地同學佔八九成，北京同學幾乎都回校休整去了。……外地同學既成主體，他們不僅通過『營地聯席會議』參與決策，自然也要求參與廣場運作。……他們有些人為了取得領導權，一次次發動『政變』騷擾指揮部和廣播站。……這使我聯想到中國（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軍閥混戰。」
- 根據來自政府的數個資料，「六四」死亡人數由300至900不等。但據當時在北京的獨立觀察家估計，平民死亡人數在2,000至7,000之間，而傷者的人數要數倍於此。「六四」鎮壓後又出現了全國範圍的逮捕浪潮。據有關估計，僅在6—7兩個月就逮捕了約4萬人，其中數千人被判有期徒刑，數百人被處死刑，大多數被判刑的和所有被處死的都是工人和其他普通市民。
- 趙紫陽下台：1996年10月，趙紫陽接受楊繼繩第二次訪問時說：「小平對耀邦很好。有這樣的結果是兩個人政見不合，主要是對知識分子問題，從『反精神污染』沿下來，到和陸鏗談話。和陸鏗的談話是導火線，（19）86年學潮也是導火線。僅這次學潮小平不會把耀邦拿下來」；「小平和耀邦分手與和我分手不一樣。『六四』前鄧對我是信任的，他認為『六四』看清了我，說我是『自己暴露的』。小平和我分手沒有耀邦那麼長的過程，只是『六四』。他和耀邦是幾年的積累。他對耀邦的信任一年一年地減少，到了最後完全不信任。」

確立市場經濟的時期（由 1992 年開始）

- 鄧小平南巡（1992 年 1 月 18 日至 2 月 21 日）：
 - 肯定「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這一點，我講過幾次。如果沒有改革開放的成果，『六四』這個關我們闖不過，闖不過就亂，亂就打內戰，『文化大革命』就是內戰。為什麼『六四』以後我們的國家能夠很穩定？就是因為我們搞了改革開放，促進了經濟發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所以，軍隊、國家政權，都要維護這條道路、這個制度、這些政策。」
 - 「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 鄧小平把判斷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標準歸納為三條「是否有利於」：
 - （1）是否有利於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
 - （2）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
 - （3）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
- ***中共「十四大」（1992 年 10 月）：
 - 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概念和正式承認市場槓杆在社會資源配置中的主導作用，標誌著市場改革派的勝利；
 - 「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目標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絕不是搞西方的多黨制和議會制。」至於如何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會議則強調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政治協商制度，以及精簡機構以提高行政效率，但不提撤銷黨組。
- 宏觀調控（1993-1996 年）：
 - 1992—1993 年間出現「三亂兩熱」現象----「三亂」指亂集資、亂拆借、亂設金融機關；「兩熱」指房地產熱、開發區熱。
 - 中國經濟「軟著陸」----GDP 增長率：1992：14.2%；1993：13.5%；1994：12.6%；1995：10.5%；1996：9.6%；1997：8.8%。
- 二十世紀末的中國農村：

- 1980 年代後期，國內一些學者把當前的農村問題區分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分別進行研究，既分析三者的關係，也研究三者各自要解決的問題。他們初步提出了「三農」問題的分析框架，並引起政府的重視。1992 年，江澤民首次提出中國的「三農」問題。他指出：「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農村穩定是整個社會穩定的基礎，農民問題始終是我國革命、建設、改革的根本問題。」
- 1996—2001 年間，全國耕地減少了 4,335.5 萬畝，這些土地都轉化為非農用地，並由此造成了大批失地農民。他們除了得到有限的補償外（大概佔土地市場價值 10%—15%），在就業和社會保障方面幾乎沒有從徵地一方得到任何保證和安排，結果淪落為「種田無地、就業無崗、低保（即最低生活保障）無份」的「三無遊民」。
- 「農民工階層」（「擁有農業戶口、被人雇用去從事非農活動的農村人口」）的崛起——1984—1989 年，中國首次出現了「（農）民工潮」；「農民工」3,000 至 4,000 萬人。到 1990 年代，由於農村日益衰落，越來越多具有初中文化教育水準的農村青年和壯年都棄農務工；又由於城市推行「減員增效」的企業改革，很多工廠企業都裁減了學歷較高，但體能、技能和勤力性均較低的城鎮工人，由學歷較低，但體能、技能和勤力性均較高的「農民工」替代。2003 年，「農民工」增加到 9,900 萬人。根據 2000 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的資料，「農民工」佔全國工人總數的 50% 以上（在產業工人中佔 57.5%，在第三產業從業人員中佔 37%），他們因此被稱為「新工人階層」。不過，他們不能享受城鎮「低保」以及社會保險。跟城鎮正式工人相比，他們獲得的是「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時」、「同工不同權」的「三同三不同」的地位。
- 二十世紀末的中國城市
 - 「權貴資本階層」——主要成員包括：一、高幹子女；二、受惠於「向地方分權」政策的地方官員及其親屬、關係人；三、1992 年後也捲入全民經商熱潮的軍隊。
 - 下崗職工——全國城鎮登記失業人數及失業率（國家統計局數字）：

1990 年----383 萬人；2.5%；

1995 年----520 萬人；2.9%；

2000 年----595 萬人；3.1%。

(不少外界專家估計，1990 年代中國城鎮失業率實不低於 10%。)

- 城市「低保」(最低生活保障)制度----1993 年 6 月由上海市政府帶頭建立；1997 年 9 月在全國正式確立；1999 年 8 月，國務院決定把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水準提高 30%。截至 2000 年底，共有 402.6 萬名城鎮居民得到了最低生活保障，國家有關支出為 27 億元(中央 8 億元、地方 19 億元)。
- 「中間階層」----主要包括：幹部群體、知識分子群體、小業主、小商販、私營企業主、鄉鎮企業家、就業外資企業的管理和技術人員，以及白領員工。2002 年，全國私營企業總數已達 202.85 萬戶；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私營企業已佔 1/3 以上的比重。「中間階層」具有以下特徵：
 1. 一定的知識資本及職業聲望資本；
 2. 從事以腦力勞動為主的職業；
 3. 所從事的職業有較高的市場回報；
 4. 具有一定職業權力；
 5. 收入和財富在社會屬於中等水準；
 6. 具有購私產房、私人汽車等的消費能力和相應的生活方式；
 7. 對社會公共事務具有一定的影響力。

二十世紀八十、九十年代改革開放的總評價

- 經濟增長：
 - GDP----1978 年：3,624 億元 → 2000 年：89,404 億元；
 - 人均 GDP----1978 年：379 元 → 2000 年：7,078 元(小康水平)；
 - 1979—2000 年，GDP 年均增長率----9.7% (1979—1990 年：8.8%；1991—1995 年：12%；1996—2000 年 8.3%)。

- 所有制結構的變化:
 - 1978 年：國有經濟、集體經濟、非公有制經濟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 77.6：22.4：0；
 - 1998 年：國有經濟、集體經濟、非公有制經濟（主要包括個體、私營經濟和港、澳、台及外商直接投資經濟）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則為 28.5：38.3：38.8。
- 人民的生活水平:
 - 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978 年：316 元 → 2000 年：6,280 元；
 - 中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1978 年：134 元 → 2000 年：2,253 元。
 - 脫貧----按照世界銀行的貧困標準計算，從 1981 年到 2004 年，中國在這一貧困線以下的人口所佔的比例從 65% 下降到 10%，貧困人口的絕對數量從 6.52 億人降至 1.35 億人，有 5 億多人擺脫了貧困。（見世界銀行 (The World Bank) 2009 年發表的報告：《從貧困地區到貧困人群：中國扶貧議程的演進》“From poor areas to poor people: China’s evolving poverty reduction agenda”。）
- 從前職到現職，實現向上升遷的流動率：
 - 1949—1979 年：7.4%；
 - 1980—1989 年：18.2%；
 - 1990—2001 年：30.5%。
- 「三座大山」：「住房難」、「看病難」、「上學難」。
- 由「基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所顯示的社會貧富兩極化（世界銀行數據）：
 - 改革開放前----0.16（表示居民收入分配高度平均）；
 - 1980 年代初----0.28（表示收入比較平均）；
 - 1995：0.38（表示收入中度不平等）；
 - 1990 年代末：0.458（表示收入不平等程度偏大）；
 - 2008 年：0.5（表示收入差距懸殊）。